



左上图：2019年上海市女性创业大赛颁奖仪式。

在优化营商环境、创业环境上动起了脑筋，帮助女性进一步成功创业。

许多人觉得，妇联的工作很大一部分是“维权”，随着妇女地位的上升，在上海这样以尊重女性闻名的国际大都市，男女平等似乎早就不是问题，在一般人看来妇联的作用似乎不那么明显了。但在翁文磊看来，妇联的工作绝非越做越少，而是越做就会发现越多需要做的事情。

“从前看不到问题，并不是因为问题不存在，而是因为我们还不具备成熟的性别意识。如今，随着性别意识的觉醒，很多以前看来微不足道的事情都成了问题。”翁文磊告诉记者，“为什么之前俞敏洪说‘女性强则国家强，国家衰弱是因为母亲衰弱了’会引起舆论反感？因为他是从男性视角来看女性，貌似是赞美，实际上却将沉重的负担强加到了女性身上，‘女性强则国家强，女性堕落导致国家堕落’，这种逻辑让女性成了背锅的——而事实上，男性和女性本应共同承担家国责任，也应共同享受社会发展成果。”

性别意识越是觉醒，越会意识到许多不平等与不合理之处。比如

一句简单的“女司机”，常常就包含着对于女性驾驶能力的污名化。又比如从前常常听到的“女强人”，为什么没有人说“男强人”？在强人前面加一个性别词，本身隐藏着“女性往往不强”的暗示。

问题越来越多，媒体从性别视角来讨论热点问题也越来越频繁，在翁文磊看来，自己“乐见其成”，因为问题就代表着觉醒，觉醒背后，才是真正的男女平等的价值观。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，女性才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潜力，为社会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。“联合国曾经提出一个‘性别红利’的概念，呼吁为了国家要充分挖掘女性的能量，因为女性几乎占到人口比例的50%。如果一个国家的发展忽略了50%人口的力量，那结果将会是令人遗憾的。”

打破刻板，追求共赢的未来

数据显示，上海女性的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——1982年，6岁及以上女性人口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高达25.9%，到2016年只占5.3%。1982年大专及以上学历程度的只

占2.2%，到2016年已高达29.5%。2018年，上海市普通高校本专科在校生51.78万人，其中女性27.12万人，占52.4%；在校硕士14.25万人，其中女性7.64万人，占53.6%；在校博士3.45万人，其中女性1.40万人，占40.7%。

伴随着学历的增高，女性的职业层次也在不断提升。在1982年到2015年间，从事各类负责人职业的女性比例从1.2%增至3.9%，从事专业技术人员职业的女性比例从10.4%增至22.4%，无论是绝对数还是增长幅度都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。

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的职业生涯和事业发展就此一马平川。另一组数据显示，上海市的劳动参与率（参与劳动力市场或积极寻找工作人口在15岁及以上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）一直在下降，而女性下降幅度更大——到2010年，上海16岁及以上的女性中，只有54.2%在工作或寻找工作，比1982年的71.6%减少了将近20个百分点——从现实情况来看，女性尽管职业层次有了较大提升，但“职业性别隔离”和“职业生涯中断”，依然是女性事业发展路上的两大阻碍。

隔离也好，中断也罢，最大的原因莫过于：女性需要更多地照料家庭，因此或主动或被动地影响了职业生涯。70年来，女性在经济、教育中社会地位的提昇，并未显著改善其家务劳动的分担。家庭中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虽然有所变化，但女性依然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。第二期和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资料显示，两性在家务劳动时间上仍存在差距——2000年，城镇女性和男性每日用于家务劳动

下图：“三八红旗手”进校园，讲述各自岗位上的巾帼故事。

